八路軍總衛生部召開醫院工作會議

去年各院治癒率達百分之七十五

饒部長指出今後工作六項原則

【本市訊】八路軍總衛生部[illegible]作會議，到所屬各醫院及療養所之醫務[illegible]兩部長報告去年工作總結，及本年工作[illegible]醫院治癒率平均爲百分之七十五（蘇芬[illegible]條件較我國良好）；同時在目前工作中[illegible]等，亟待改進。各與會同志亦對過去醫[illegible]藥部長、供給部易部長講話。最後由饒[illegible]樸素切實、具體了解情況的工作作風，[illegible]了休養員；三、醫務工作爲醫院工作的[illegible]物質困難；六、遵守各種法令，杜絕貪[illegible]會議，討論如何從政治工作上保證行政任務的完成，直屬政治部[illegible]主任亦出席指導。兩會議前後共達五天，於前日結束。

通訊 優點·缺點·經驗·教訓

※延安縣牡丹區徵糧總結中的一個座談會※

黃流

延安縣牡丹區，公糧一、八五〇石，公草二四〇、〇〇〇斤）。從十月三十日開始，作了一個月的宣傳調查，二十天的徵收，是完成了任務的。

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開了一個座談會。十八個下鄉工作的幹部，集中在區政府的大窰裏，睜着睡眠不足的眼睛，仍然很有毅力地談着他們今年工作的優點、缺點、經驗教訓。

史：「今年的民主搞笑啦！五六月間，有些老百姓說不開民主，認爲參議會不頂事，這個觀念現在改變了。有什麼話？敢說出來，敢鬥爭。像二鄉的劉海旺、裴金和四鄉的曹生俊，他們覺得糧重了，就跑到鄉參議會上算賬。」

張：「今年不抽目標，大頭子可高興的過餘，中農總去年出十四石，今年才出了十五石三斗，他說：「哎！早知道今年是這樣，我就多種幾垧地」。」

李：「有些人害怕民主，我就覺得民主是最好的辦法。一個老婆婆過去不出羊毛稅，這次又想「要死狗」不出救國公糧。鄉上的幹部誰也怕惹她。我給她解釋了幾回，她不聽。爲她召開了一次行政村的羣衆大會。在大會上羣衆要和她講道理，這個一句，那個一嘴，就把她教育好了。」

陳：「老百姓對今年徵糧的辦法是滿意的。昨天我在二鄉專門收集徵收人民的意見，都說：「不差甚。」這主要的是按照邊區政府徵糧條例的原則，做到了公平合理。難民不徵收，（有六十二戶在羣衆大會上自動歡迎十四石八斗七升，實際免徵是一二二戶）老戶徵收了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人人負担，這是合理的一方面，還要實行廣泛的民主才能公平。如果葉萬金不敢說話，不敢到參議會上去算賬，他的負担不是就不得公平了嗎？可是，公平不是平均主義，像例上規定每人以五斗細米爲起徵點，有個別鄉的幹部不了解，認爲每人除徵收外搭下五斗，這是不對的。」

孫：「民主要有正確的領導。不要超過了民主。像四鄉劉家坪，二流子活動一莊子人鬥爭富農常四。不然，就像沙溝子的糧輕了，參議會給它加五斗，一窩子老戶就想『民主』給難民負担。要不是原則把握得緊，這樣的『民主』不是糟糕了嗎？」

史：「工作要操心哩，不敢馬虎。這次二鄉的幹部算糧數，到了三更半夜，馬馬虎虎就『對了！對了！』結果皮家溝短了一石糧，又連夜下去做，豈不冤枉！」

張：「幹部是很吃苦的，不回家，會議在那達開就到那達，都是雞叫才睡覺。」

黃：「證明幹部起决定作用。我在四鄉就有這樣的例子：像上石灣這個莊子，鄉長、村長、議員代表們自己報糧實確，出糧合理，羣衆也就樂意公平負担。像裴家渠的代表常正奉自己隱瞞還包庇別人，工作怎麼能够順利呢？所以就落在上石灣的後面。」

孫：「還有一些鄉的幹部不主持會場，不好好的領導羣衆，像二鄉的婁好先蹲在一邊，讓羣衆鬧嚷了半天，一點效果都沒有。」

陳：「這一次各組織都動員了，婦女沒有動員起來。美中不足。所以三鄉閃電兩村藏不當在羣衆大會上自動的出了六斗公糧，回去給婆姨駡得不敢在家裏睡覺。」

文：「婦女是可以動員起來的，新莊溝武占做的婆姨就够做模範。武占做在大會上衆人評判他出八斗糧，他貴賤不承認。他的婆姨就說他：『抗戰困難，別人隔搭，你多出一二斗也不樂意，還要說誤開會的時間出！』於是她自動歡迎出一石糧，三百斤草。新莊溝的糧草呼啦！一下子就徵開了。」

李：「主要的是宣傳工作要深入，宣傳不到，她解不下，不說出救國公糧的意義，不說一石，一斗恐怕也成問題。我在一鄉，鄉的幹部給我說：『劉夏家溝的工作難做。』我考察了一回，就是宣傳工作不深入，問老百姓：『八路軍和誰打仗？』他們都解下打日本。再問：『打成怎個樣子？』就答不上。有一半人不曉得現在邊區所處的環境。在羣衆大會上我給他們解釋了一回，串門子又給他們個別拉話。以後的工作就好執行。過去在這個莊子連黃米撈飯也吃不上，這次我還吃了幾頓白麵哩！」

黃：「對咯，我們對老百姓的宣傳教育確實不够深入，犯了攏統的毛病。光說：『社會的進化』『時勢到了這達』。到底社會爲什麼進化？時勢到了那達？……沒有詳細解釋。所以老百姓解不下。我們也就連黃米撈飯也吃不上！」

陳：「那一個莊子的宣傳工作做的好一些，那一個莊子的糧就比較實確。各鄉都有這樣的情形。二鄉許家溝是史同志在那裏，徵收的時候還增加了八十多石糧，不能不說是宣傳的效果。」

馬：「農民的私有觀念很濃厚，誰也想壓下一些糧，少出幾粒。要做到又公平又合理，就要利用方法方式調查。旁敲側擊，拉閑話，問鄰居，問婆姨，問伙子。二鄉的劉海旺就做得巧妙。溫家的糧誰也調查不出來；溫家的挑份子說媒。他就連要帶笑給溫家打多少。有人說媒當然很高興。他就捉住這個弱點，說：『討婆姨是不成問題，只要你有谷子。沒谷子……』份子就急着說：『谷子是不多，今年才分下五石……』這一下就調查出來啦，你想：一九的份子，份子就分得五石，主家打多少呢？——五十石。」

李：「研究是很重要的，調查了你不研究，怎麼能够知道誰實誰虛？誰重誰輕？夏家溝岳玉德家裏三口人，報地十一垧，收粗糧四石，麥子一石五斗。出租子一石一斗。自已壓下了一把，還鬥爭窮人。莊裏的人心裏不平，給我說。我考問他一次，他高低不承認。我從各方面研究，他出的租子太大啦！咱區那裏有一垧山地出一斗租子的呢？唔，問題就在這裏了。一口把他咬定，結果算出了二十垧地，八石粗糧，二石麥子，他才無話可說。」

沈默了一陣，主持會的人問：「誰再有意見？」

黃：「徵草是新的工作，大家一定有很多新的經驗，希望多談一些。」

朱：「徵草主要是根據草的收穫量和牲口的數量多少爲標準。老百姓說：『有地才有糧，有糧才有草。』是對的。所以以草的收穫量又以耕地的面積和糧的收入爲依據。然後照有牲口的少出，沒牲口的多出的原則徵收。四鄉開頭沒有按這個原則把數目字放在參議會上討論，就分開。二政村約約摸摸，一萬五千斤，三政村一萬二千斤。二政村全政村的人都鬥爭起來，說：『二政村的草重了，三政村的草輕。』一政村的人也這樣說。後來又在參議會上研究。若是按糧算，每斗出草十四斤半，二政村確是比三政村重了五百斤。可是三政村比二政村多七個牲口，結果從二政村撥了三百斤給三政村。老百姓才說公道。」

劉：「還是交給參議員他們做，公平合理。他們每個人代表五十人的意見，他對他那十戶八戶人家收多少谷子，多少糜子，多少草，當然有個關照。」

朱：「代表也會包庇要私情。像四鄉上石溝那個代表馬占尙，調查的時候，他只有一個驢，一個牛。到了徵草的時候，他就有了三個牛一個驢。」

馬：「代表要私情，老百姓不讓他要，他還是沒有辦法。」

黃：「徵草要做得公平合理，調查就更要仔細深入。要知道他種幾垧谷子，幾垧糜子，收糧多少，收草多少，才能定出合理的標準。普通谷草一把是二斤至三斤。把一摟，六把一扠（兩手抱起兩摟的意思。）年頭好每扠能打谷子斗半。咱區今年收成平常，每扠也打一斗。依一般農民說平均每垧地的收成是四斗，每把谷草按二斤半算，每垧地收草是六〇斤。咱們區今年每垧地徵收的平均數：糧是一斗一升五，草是十五斤。糧草的比例也是合理的。」

談到這裏，話就帶住了。主持會場的人又問：「誰再有意見？」仍是一片沈默。「沒有了，就散會吧，以後大家多下功夫做調查研究。」

拍手，笑，人就散開了。

鄜縣運鹽隊出發

縣議會決定損失補償辦法

【鄜縣訊】本縣冬季運鹽一千馱，現已佈置完竣，經縣參議會決議：依照有牲口出牲口，有糧草出糧草，有人出人的原則，以三個牲口爲一小組出發。規定每個牲口運鹽一趟，給料二斗，草價洋六十四元，每人每天伙食費二元（並規定回來時還須清算向大家公佈）；若因運鹽走後家庭無勞動力時，得由其他民衆幫助解決柴水問題。由於該項决定的通過，使一般羣衆，均安心出發。同時對牲口死傷問題，也規定出保險辦法。現各區運鹽牲口已於十二——十五日全部出發。又此次動員工作以永平區爲最佳，運鹽牲口八十四頭，均經區政府檢查認爲健壯。

綏德駐軍決定春節活動辦法

【綏德訊】駐軍旅政治部，日前決定關於春節工作辦法如下：（一）遵照邊府決定，照舊曆年放假五天，在假期中舉行「春節反侵略運動」。（二）組織與推動羣衆性的宣傳文娛活動，如演戲、秧歌、高蹺、燈謎各項競賽，配合目前任務，以反侵略、反迷信運動爲中心內容。（三）在部隊中開展文娛工作，如開聯歡晚會，對傷病員、抗屬及雜務人員等進行慰問慰勞。（四）儘量聯合地方上黨政民機關學校團體，動員廣大羣衆參加，發動該隊小組進行家庭訪問，代寫春聯貼年畫，多多採用民族形式，但須力避免庸俗化。

小言 保障人權

「除司法機關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處罰……」這是二屆參議會通過，經邊區政府命令公佈的「保障人權財權條例」規定得極明白的。但是，在延安，卻發生了不幸的「學[illegible]命案」：學療的總務科長、秘書和管理員，竟然將劉世有綑押起來。以致釀成人命大案。從這事件裏，我們看出，我們有的同志還不懂得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乃是建立革命秩序的工作，還不曉得，隨便綑人押人是[illegible]的「游擊作風」之一。

這類違法事情，在邊區恐怕不只這一件。我們願意喚起社會人士，嚴重注意它的揭發與糾正，讓我們共同努力於革命秩序的建立與鞏固！

發展邊區科學事業

邊府將召集科學界討論

【本市訊】去年第二屆參議會上，自然科學研究會提出「發展邊區科學事業案」，已經參議會具體議決：「該案交建教兩廳，召集自然科學研究會及有關機關，根據邊區具體情形計劃，科學事業，依據實際情況辦理」。聞自然科學研究會，已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最近一月內，收到各學會意見書及預算多份，內容頗爲具體，如對邊區農業發展辦法，土質改良，科學通俗教育辦法，工廠技術研究，醫藥衛生如何劃區，怎樣實施，等等。近日各方意見，正在源源寄到，建教兩廳，亦通知該會將於最近召開籌備會，一俟林、李主席返延，即召開大會，準備討論兩日，邀請科學界人士及有關機關學校代表出席參加。討論內容：科學教育、經濟建設、及醫藥衛生等問題。

文藝

第七十六期

關於對中國小資產階級作家的估計（就商於歐陽山同志）

林昭

編者按：對於林昭同志的這篇文章，我們以爲還有值得討論的地方，這裏是作爲研究的性質刊出，希望尙有別的同志發表意見。

歐陽山同志在他的一篇論文「抗戰以來的中國小說」（載「中國文化」三卷二三期合刊）裏，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並列在一起，下了這樣一個共同的判語：

「他們是先天的孱兒，即在文學成就上也是薄弱，渺小，幾乎是不足道的。」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判語下得對不對吧。

說中國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先天的孱兒」那是眞實的：他們就生了一付孱弱的性格；歷史所給予他們的創造力是那樣的微小，以致於他們在文學上不能創造出什麼值得稱道的東西來。這是一個在文化思想上「比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新民主主義論」）的階級，似乎生來就不是爲了創造，一切從他們那裏反映出來的，都顯得多麼寒傖和磽淡啊！

至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卻顯然相反。比起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來，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一切方面都走了一[illegible]了輝煌的成績，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跡印。

雖然，在小資產階級作家的隊伍裏，也有一批多變的人物，每當革命情勢緊張的時候，他們就急忙的從革命文藝的陣營中蹓了出去，並且，「這樣的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在做革命的文學家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對於革命的眞正益處是不大的。但，這樣的人物畢竟是很少的，他們的存在並不能損污和妨害到最大多數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應有的光榮。無論如何決不能由此就全部抹殺小資產階級在中國新文學上的功績，並進而說他們都是「不足道」的「孱兒」。

記得一九三一年時，當魯迅先生說過了「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實際上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之後，差不多同時，接着說了「在現在中國的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上海文藝之一瞥」）可見魯迅先生也是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文藝視爲「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實際上這裏所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以共產主義思想爲領導的新文藝運動）的主要構成部份的。

然而歐陽山同志是無視於這些事實的。當他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拿來同俄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相比較的時候，他並不去認眞地察看這兩個國家的實際情形，研究他們之間的根本上的不同，而僅只文不對題的複述着高爾基批評俄國知識份子的話：「他們所受的歷史訓練不如西方諸國之深，故他們的道德之分化（我看了本文的兩個中譯本在此處都是寫着「頹廢」和「墮落」這兩個相近的字眼，不知爲什麼歐陽山同志把它改作了「分化」？）的過程，智慧貧乏的過程，遂較西方知識份子爲速。」並且更加深的說着：「他們更比不上俄國的知識份子了，他們是先天的孱兒。」高爾基是對的，然而歐陽山卻錯了。高爾基所批評的俄國知識份子是些怎樣的人物呢？「在舊的、革命以前的時代，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知識份子，首先就是由有產階級——貴族、工業家、商人、富農等出身的人們所組成的。在知識份子的隊伍中，雖然也曾有過從小市民、小官吏和甚至於從農民和工人出身的人，但是，他們沒有，並且也不能在那裏起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整個說來，知識份子當時是就食於有產階級並爲他們服務。」（斯大林在聯共黨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在整個俄國知識份子的隊伍中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所佔的分量異常微小，並且，多半被迫爲有產階級服務，這就是當時俄國知識份子的實際情形。他們「沒有力量決然躍入歷史所喚出的勞動層之中」（高爾基語），因此，「墮落」和「貧乏」成了他們不可免的悲運。但在中國卻完全不同。由於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第一，在這個國家裏，小生產者佔着絕對的優勢，造成了一個龐大的小資產階級層。在知識份子的隊伍裏，他們也估了一個極大的數目；因而，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比俄國、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來得強大。第二，同時，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遭受着任何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沒有遭受過的殘酷的命運。統治階級的迫害和摧殘，封建傳習的壓抑同束縛，帝國主義的奴役與歧視，在在都迫使得他們幾乎不能生存下去；爲了要像一個人樣的眞正活下去，他們就不得不傾向革命，加入戰鬥，去努力改造這非人的境遇。第三，自從「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性質，已經從舊民主主義的範疇，而成爲新民主主義的了。這個革命，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或不完全是資產階級領導，而是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了。所以，參加這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事實上是在爲革命、爲無產階級服務。這些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之所以不同於俄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之所在。總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具有相當豐富的革命潛力和創造精神的一羣。「五四」以來，他們中間的最大部份都或遠或近的跟隨在無產階級之後，和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一同爲中國新文化而奮鬥着。他們所走的路是大道，所以，他們既不能走向「頹落」，也不能感覺「貧乏」；相反的他們是在逐漸的上進和不斷的使自己變得堅實起來。

× × ×

大概是一種巧合吧，像俄國的知識份子經過了一九〇七——一九一七底十年間一樣，中國的知識份子也經歷了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的一個恐怖和黑暗的十年。但這兩個十年對於兩個國度的知識份子試鍊的結果是怎樣的不同啊！俄國的知識份子、連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內都一起墮落了，所以迫使得高爾基不能不毫無例外的稱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七爲「俄國知識份子底最不知羞恥的十年」。但在中國，除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走向了反動，在創作上陷於停滯以外，大部份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雖然也經過了一個短時的猶豫彷徨，在新的統治面前，雖曾一度感到了「太平人的寂寞和悲哀」，但他們不曾屈膝。他們抗議，他們申訴。自然，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多少流露出一些灰暗陰鬱的色調和悲觀的氣氛。但這和安特列夫、阿志跋綏夫式的頹廢是絕然不同的：後者是一種向下的宿命的絕望和消極的「自作沉滯」；而前者卻是一種向上的不甘於現狀並企圖衝破現狀的苦悶和煩燥。這可以從當時許多作品都瀰漫着反抗的調子、蘊積着解放的熱望得到證明。茅盾先生對於這個「十年」初期的一些作品，曾經這樣說過：「在那一堆美麗樸素的封面下，我彷彿看見各位作家的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性格，然而，又有一種共同的精神：努力要造創出新的美的，以點綴這枯燥的人生，使它少覺可愛可安。又有一個共同的心：努力要訴出他們的悲哀，[illegible]他們的希望，[illegible]他們的理想，以期取得一個兩個同樣的希望，[illegible]人生苦鬥的傷痕的心的共鳴，使他自己暫時覺得並不是住在沙漠裏。」（「[illegible]」）又說：「雖然我們這人生照舊的灰色[illegible]的影象，但是畢竟我們中間只有了不少希望未死、理想未死的人們在那裏滋長奮鬥，努力要撤去舊的換上一些新的。」（同上）從這兩段話裏不正是可以很清楚的窺出當時中國小資產階級作家的雖然有些悲哀、孤寂、彷徨，但絕不是沉淪、停滯、絕望的特殊心情和面貌麼？同樣，當時作品的內容和主題雖然還顯得狹仄浮面一點，但比起第一個十年來，卻是放寬和加深得多了（還在「十年」的後半期表現得特別明顯，譬如，許多作品描寫了抗日人民的鬥爭，工農大衆，成了作品中較常出現的人物）。灰暗的色調也隨着減淡了。生活前進，作家也前進了。他們和無產階級及共產主義知識份子結合得更緊了。總之像歐陽山同志那樣，僅僅把他們看成一些無可再壞的「粗製濫造的戀愛小說家，空虛瞎味的個人革命家，是找尋安靜粉飾太平或企圖居住在戰場上『無人地帶』裏的可憐虫……」，無疑是極不恰當的。

而尤其令我們驚奇的，是歐陽山同志對於抗戰以後的中國小資產階級作家的看法：「到了戰後，他們或者落伍，或者沉默，或者冷淡，……」「有些變成了空虛曖昧的浪漫主義者，甚至連批判能力都沒有了的現實主義者，客觀主義者和個人感傷主義者，……」這是怎樣令人不解呀，在極度黑暗恐怖的抗戰以前，他們尙且不甘於「落伍」，不甘於「沉默」，不甘於「冷淡」，而是用自己的筆不斷的揭露着黑暗，呼喚着光明，而求着解放，難道當黑暗被沖淡，而接近着光明，接近着解放的時候，反而「落伍」「沉默」「冷淡」，反而變得「空虛曖昧」，「連批判能力都沒有」了麼？這是怎樣的不可思議啊！而事實是相反的，它合理的證明了：小資產階級的作家不但沒有「落伍」「沉默」和「冷淡」，而且是在抗戰的巨流中變得更前進更堅強了。在他們的筆下許多優秀作品的不斷產生這個事實就是一個確鑿的證據。在「抗戰以來的中國小說」這一篇論文裏，歐陽山同志自己所評爲「優秀的作品」的不正是有許多是爲目前的小資產階級作家所寫的麼？當然，歐陽山同志會回答說：那是「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思想而進步了」的那部份小資產階級作家所寫的。是的，歐陽山同志的確是在「或者落伍，或者沉默，或者冷淡」之外，留下了這樣一個小小的例外；「或者轉入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營壘。」然而這還是不通的，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是從「五四」就開始了的，而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卻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個革命，怎麼說他們現在才「轉」進來，（而且從作者的口氣看來）僅僅是一小部份呢？這眞是令人莫明其妙了。

難道，我們之所以不理解這些，是因爲我們「對於中國小說底史的知識不充分具備」和「對於中國的現實生活不十分了解」的緣故麼？然而，無論是過去的歷史或者目前的現實卻都清清楚楚的告訴了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作家不是什麼「不足道」的「孱兒」，而是值得特別稱道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文藝革命運動中的主要力量。

（完）

從悲傷到喜悅

尙吟

讀杜甫的詩，面前總是呈現着一幅悲慘的圖畫：流亡，飢荒，離亂，兵災和死亡，尤其是讀到他的名作「三吏三別」時，好像那涕淚縱橫的可憐老婦人和她那淒傷的啜泣聲，若隱若現的在周圍波動着。如果照梁任公所說，工部的詩是以哭叫爲人生目的的話，那他那深切動人的悽惻的呼訴，確够表現出他對人生底哀感了。

我喜歡他的詩，但也不忍讀他的詩；我想當時正是唐朝的黃金時代，人人都在歌頌繁華的太平，個個都陶醉於粉飾的歡愉中；而他，卻在引人到太平景象的另一面——存在無限悲哀的那一面，當朝文武一定是很厭棄這位悖時人物的。

其實，這也不能怪工部不識時務，因爲當時確是存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實況；又如拿我國今天的實況底下來說吧：「有失地千里而不止典刑者，有朝首死守名城而夕即逃棄者，有身爲國家重臣而躬預商販之計者，有手操典士之柄而即製造朋黨以煽構學潮者，朝秦暮楚，翻雨覆雲，狐埋狐猾，靦以爲恥，更所在皆是。」如此國情，能够教詩人一味去爲抗戰的勝利謳歌麼？如果命令說：「說呀！你只要說勝利就在今天。」可是詩人說出來的，卻件件是那一面，不合乎當朝文武的要求，而他們又不得不成了悖時的人物了。

然而，杜甫果眞是個只會哭叫的詩人麼？他爲喜悅的情感比誰還要寫得逼眞，舉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來說：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趨洛陽。

這種破涕爲笑手舞足蹈的情形，讀之使人有同樣的快感！所以今天只要勝利眞的有所「聞」，我們不愁沒有更出色的如此動人的詩。